



西方译论术语之名与实

朱灵慧

摘 要: 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各类术语有共性亦有特性,有发展也有传承。术语的产生都有其具体语境,如其后隐藏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者的主体性等。在借鉴使用时,需尽量参照一手资料考究甄别,厘清术语的名与实,避免对术语使用范围的随意泛化。

关键词: 术语; 语境; 社会性; 主体性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国外译学经典著作的不断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以其流派分明、术语林立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学仁,这无疑有助于开拓学术视野,丰富研究维度。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西方译论庞杂的术语体系常令人眼花缭乱。各术语因产生于不同语境而有不同所指,彼此之间貌合神离;有的术语在学者提出之时便有所针对;亦有术语晦涩难懂,并无实际理论价值。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倘若拾得一言半语便如获至宝,牵强附会加以套用,必然导致术语内涵的歪曲和误读误用。本文拟通过分析术语产生的具体语境,厘清脉络,探寻西方译论中术语的名与实。

一、译论术语之貌合神离

综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每个阶段都有其不断推陈出新的术语作为显著标志。就翻译方法而言,从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的“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的区分,近代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走向作者”或“走向读者”的途径,以及当代译论中的“归化”与“异化”(韦努蒂)、“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纽马克)、“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霍斯)、“记录式翻译”与“工具式翻译”(诺德)等等,均试图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概括翻译方法。如不加探究和追问,上述划分易使人误入认识上的两个极端:或认为各组划分大同小异,或感慨于西方术语的异彩纷呈。但是,略加考究甄别便不难发现,各组概念有共性亦有特性,有差异亦有传承。

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保留相同的观点和形式,即大家所说的思维方式,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为此,我认为翻译时没有必要字当句对,而是要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①。这段话成了“西方翻译界的传世名言”,“更是成了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此段论述前还谈到两个前提:一是翻译的起因,作为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修辞学家,西塞罗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起翻译这一任务,以纠正学生对演说风格的错误理解;二是翻译的内容,在此特指翻译埃司奇涅斯(Aeschines)与狄摩西

^① 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p. 9.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19 页。

尼(Demosthenes)这两位演说家的著名论辩。结合上下文理解西塞罗提出的这一翻译原则,可以推测,“作为演说家”式的翻译,即“带着激情,带着表情,有声有色,挥洒自如,词语鲜明、生动、准确、富有感染力”^①。尽管无从考证西塞罗是否将此作为翻译一切文体的通用准则,是否在他自己翻译色诺芬(Xenophon)的《经济学》和阿拉图斯(Aratus)的《论现象》时也采用了同样的翻译策略,但至少可以推断,西塞罗倡导的“演说家”式的翻译是为了在译文中更好地体现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其文体指向侧重于演说辞。

哲罗姆是西方基督教会权威神学家之一,以其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而驰名。在《致帕玛丘书》中,他为自己辩说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并在西塞罗的“字当句对”(word-for-word)基础上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意译”(sense-for-sense)。这一组为后来译学界相提并论,广泛引用,并争论不休的概念其实源于不同的背景。哲罗姆曾宣称,在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他不是逐字对译,而是以意译意,但《圣经》的翻译除外。用倡导“直译”抑或“意译”来归纳哲罗姆的翻译观难免会有简化之嫌。当时他应尤西比乌(Eusebius)之邀翻译了伊皮法纽主教(Pope Epiphanius)给耶路撒冷主教约翰(John, Bishop of Jerusalem)写的一封信,此信作者地位甚高,内容关乎基督教教义,其翻译备受关注,翻译时些许的增减便会引起强烈反应与非议。事实上,哲罗姆此前的宣称是为了给自己辩护,证明即使在被控诉的翻译中做出了增减,但却无碍于宗教教义的传达,他还借用西塞罗和贺拉斯的权威地位,援引他们的论述作为支撑。其实,哲罗姆并未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他看来,当原语语言的美妙难以在译语中得以体现之时,逐字翻译,译文会显得荒谬;改变语序或措辞,又有滥用译者职权之愧。这种矛盾的心理不仅源于语言本身之间的差异,还因慑于宗教经典的权威和神秘。从哲罗姆的论述和其翻译《圣经》的实践分析,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调和,即译者应适当做出保留和取舍。

到了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兼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采用二分法,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读者走向作者”(reader-to-author)或“作者走向读者”(author-to-reader)的两种途径。尽管施莱尔马赫并未直接采用直译与意译这两个概念,但他指出以前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方法都应归于这两种途径之内,并且认为这两种方法大相径庭,不可混用,译者无论采取哪种途径都应该坚持到底。在分析比较二者利弊的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自己的主观偏向,即让“读者走向作者”。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主观偏向的良苦用心所在。施莱尔马赫在此所言的读者特指德国读者,他将翻译看作是普鲁士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实践,即借助翻译精英文学丰富德国语言,同时助德国文化完成其全球统治的历史使命。其中暗含的矛盾是:一方面,出于爱国之心,对外国文化必须暂时屈尊,最终目的则是使德国文化超越其他文化;另一方面,施氏的理论表现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味着他承认德国文化尚需借助其他文化得以发展^②。作为一名政治激进主义分子,处于当时的弱势文化,他希望德国强大,认为在翻译中保留异域语言文化差异有助于丰富德语,这是他提倡“读者走向作者”的深层原因所在。

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与施莱尔马赫一脉相承,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理论,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韦努蒂对翻译的讨论是以英语这一强势语言为目标语而展开的,他所列举的个案都是从弱势语言(如意大利语)译入英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在源语偏离英美文学规范时,他反对“透明”的翻译,主张采取“异化”的策略以重现原作特点,认为这既有助于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译者亦可藉此改变自己的隐身状态。细细比较施氏与韦氏的观点会发现在二者表面相似的幻影下存在着本质的目的上的差异。如前所述,在施氏的理论框架中,作为目标语的德语处于相对弱势,“读者走向作者”是为了借强势语言之力改造目标语,恰如鲁迅主张翻译中采用欧化的句法是为了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结合施莱尔马赫与韦努蒂身处的语言系统的地位差异以及其所处的语境差异分析,他们提出的术语貌合神离,相去甚远。粗略看来,施氏与韦氏都倡导“文本中心论”,但施氏的出发点是指在将外国文本译入德语时(强势语译入弱势语),要尽量保持外国文本的异域特色,以便为德语输入新的养料;而韦氏探讨的是将外国文本译入英语时(弱势语译入强势语),要充分展现弱势语特色,以挑

① 郑海凌:《文学翻译界说考辨》,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96页。

② Lau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 99.

战翻译作品在英语中的二流地位。

也有西方学者尝试对类似术语予以区分厘定。例如,纽马克曾经指出,奈达的“功能对等”与其“交际翻译”意义相同,都强调译文对读者的影响;而与霍斯的“隐性翻译”就只能称得上相似,因其关注的焦点是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在他看来,奈达的“形式对等”属不合理的翻译方法,而霍斯的“显性翻译”与“语义翻译”较为近似,只不过“语义翻译”更多论述了直译的可行性。除了对概念内涵予以分辨,纽马克还注意到几组术语在提出时所选用的文本也各有侧重,奈达的理论以《圣经》翻译为根基却又试图使其不宥于此类文本;霍斯在论述“隐性翻译”时多以科技、旅游、金融等题材为例,论述“显性翻译”时以宗教、政治、文学类文本为支撑;而纽马克自己则运用普鲁斯特的作品节选探讨“语义翻译”,用政治专刊讨论“交际翻译”^①。

通过概述上述几组术语的语出情境可以发现,原本貌似的术语之间实有千差万别。西方翻译理论中术语与术语之间的这种看似相近,实则迥异的例证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赘述。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其相似性、传承性固然不容置疑,但这种相似性、传承性背后的实质差异亦不可混淆。

二、术语产生之语境限制

西方译论不断推陈出新的术语体系确实对翻译研究的广度、深度、维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复杂性也导致在实际引介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耐人寻味与深思。不仅上述貌合神离的术语应引起警觉,标新立异、滥造术语的现象也不无存在。如若在引用术语时不加区分地简单套用,在评介西方译论时完全依靠未必可靠的二手资料,或是在运用术语时将其抽离语境、牵强附会,则必然会导致对术语内涵的歪曲和误读误用。“虽然这种倾向不是主流,可已经给我们的借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重视。”^②没有哪个理论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也没有哪个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在具体阐释运用术语或使术语本土化的过程中需对其内涵、实质仔细分辨,并还原至历史语境考察甄别,避免因疏于判断而产生的不当。

(一) 术语产生的社会性

翻译研究者与译者、译作一样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③。毋庸置疑,研究者提出某一理论或某一术语时,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和限制。如若追溯西方译论中的“直译”与“意译”之源,不难发现其与权威、宗教等外在因素休戚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当时两种翻译方法的对立就是信仰的对立。例如奥古斯丁,作为一位神学家,在他看来翻译就是一个统治人民的工具。他深信上帝的感召,对原文的坚守即是对宗教教义的坚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语言学家多雷,正是因其译文被控“曲解”了柏拉图,“使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而犯有信奉异教罪”,结果落得尸体与作品一并被焚。或许正是屈于宗教压力,哲罗姆才在公开宣称提倡“意译”之时,特意强调《圣经》不在可意译的范围之内,因为《圣经》中的句法结构都是富有神秘意义而不可更改的,以此寻求对自身的保护。甚至奈达的“功能对等”也是从传教士的角度出发,强调上帝的旨意一定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说各种语言的信徒。

如果《圣经》翻译中是原作的经典与权威对相关术语的产生起到了制约,那当代翻译学在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等国兴起这一现象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术语产生的社会性。这些国家在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初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开展翻译的实证研究领域,也走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前列。反观当代西方译论中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源起,无一不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关。提出多元系统理论的埃文·左哈尔作为以色列学者,身处相对较为年轻的文化系统,深刻感受到翻译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如巴勒斯坦的赛义德、伊朗的拉什迪、印度的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和尼兰贾娜等,几乎均为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中成长的一批知识分子;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英法两大族裔政治对立、语言排斥、文化分离的具体国情”赋予了“女性主

^①Jeremy Munday.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0.

^②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③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pp. 26~27.

义文学翻译的加拿大特色”^①,涌现出以西蒙·弗洛托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功能主义理论则发轫于欧盟的建立和各个欧洲国家开始广泛的合作与产品进出这一大背景之下^②。事实上,任何翻译理论或术语都在特定的条件下孕育而生,无疑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

(二) 学者的主体性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如同译者有主体性一样,翻译研究者同样具有主体性。从事研究的个人或群体的学术兴趣决定了其所关注的是这个或那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至少起初的出发点只是主观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料的收集,经过多方论证,逐渐趋向客观。由此可以推测,理论思想和术语体系既受研究者自身学术视域的影响,又用于为其特定的理论目的服务。

在翻译研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尤其引人瞩目。各领域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开始对翻译研究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语言学学者、比较文学学者一如既往地翻译予以关怀,另有民族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乃至国际政治学等领域学者都对翻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学科。这些来自不同学理背景的学者的介入对拓展研究视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翻译理论术语异彩纷呈。如勒弗费尔与巴斯奈特主要是从文化视角,特别是从其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皮姆丰厚著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突出翻译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立场显然与其所接受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不无关系;霍恩比在德国的经历使她对德国翻译理论情有独钟,在《翻译研究中的转向——是新范式还是角度转换?》(*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一书中,作者“大力介绍了相对处于弱势的德国和东欧一些理论家的思想”^③。另外还有威尔斯、穆南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源于心理学的“有声思维”(TAPs)、从社会学借用的概念“模因”(meme)以及来自人类学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等术语均源于不同的学科。学者的治学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研究视角和切入手法。鉴于此,在对翻译研究者的观点或术语进行考察时,应以辩证的方法,包容的心态,考虑其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苛求某一理论或术语成为万应灵药。譬如,在当今讨论“文化转向”一词时,无限定地予以套用或妄加批评都有失客观。结合提出该术语的学者背景和话语语境就会发现,文化研究派的着眼点本来就在文学翻译,无意也未曾想将其作为普适定律。

除了受学术视域的影响之外,翻译学者的主体性还体现在有意或有针对性地采用某一术语,实现其学术目的。西方译论术语中也不乏标新立异、另辟蹊径之举,实乃旧药换汤。芒迪就曾感叹翻译研究的困难之一就是术语泛滥^④,指出纽马克一面批评“等效论”,一面却又就翻译过程和目标语读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许纪霖在谈到国内外学统问题时曾指出,“一些震耳发聩的新思潮虽然很时髦,但如今隔一段时间来看,不少是学术泡沫,经不起历史的淘洗”^⑤。在霍恩比看来,跟很多新兴学科一样,翻译研究的一大恶疾在于总是重新发明轮子,这种自说自话或许是因各国或各领域学者缺乏对话所致,但着实使原本复杂的学科更加扑朔迷离。有研究者担忧,“假如翻译研究没有了那些时髦的术语,翻译研究还有没有实质性的内容?”^⑥

(三) 术语自身的模糊性

另外,有些术语界定不清,内涵模糊,语焉不详,不仅未能起到归纳的功效,反而引发了诸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国内外学界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很大程度上就由此而起。德国学者霍恩比曾指出,翻译研究中的很多分歧都源于对基本概念的不同使用,比如除了“norm”外,其它还包括“conventions”,“values”,“sameness”以及“equivalence”等。为此,翻译研究中对基本术语哪怕一丁点的一致也会有助于达成共识。皮姆在论及“system”这一术语时,认为“系统理论”仅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就包括左哈尔借鉴

① 陈喜荣:《一葩独秀——论女性主义文学翻译的加拿大特色》,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01~105页。

② 胡显耀:《批判的眼光看西方译论——凯伊·道勒拉普访谈》,载《外语学刊》2005年第4期,第97页。

③ 邓静:《〈翻译研究中的转向:是新范式还是角度转换?〉评介》,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第74页。

④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46.

⑤ 许纪霖:《学术研究中的家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9页。

⑥ 黄德先:《翻译研究的现实转向》,载《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第17页。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描述翻译研究所指的系统、赫曼斯的“系统”等。由此导致的最大不便在于无人确定到底“system”指的什么,更不用说它与规范、历史或翻译的关系了。复杂的专门术语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同样令人费解,如霍尔兹曼塔里“翻译行为”理论中的“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晦涩难懂,根本无法解释单个译者的实际翻译情况;弗米尔的“translatum”也无益于深化翻译理论。

三、结 语

如前所述,术语和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语境限制,在运用前需弄清理论产生的背景,了解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提出来的,即明白理论从何而来,为谁所用。通过对部分术语语境的探究与分析,笔者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只有尽可能地深入第一手资料,理解和吃透西方译论术语之名与实,才不会在实际运用中斩头去尾,抽离语境地误用。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学界对韦努蒂“异化”概念的误解误用和争议,就是由于对术语的名与实不甚了解,仅仅凭借半路得来的只言片语企图投机取巧。韩子满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没有读过多少西方译论原著,国内学者的评介著作也没有仔细读过,却拿来一堆术语,大谈西方译论如何如何”^①。早年国内对西方译论的了解和掌握受客观条件所限,大多只能借助《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廖七一,2000)、《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2004)等著作的勾勒,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衍变。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纵深发展,国内推出了数套原版翻译研究丛书,对深入理解西方译论,弄清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辩证地、客观地对待西方译论中的术语,既不能照单全收,亦不能全盘否认。目前,国内不少著述对西方现当代译论越来越多的“反思”、“质疑”之声充分显现出这一理性的态度。更有学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创新,提出卓然洞见。如曹明伦教授在指出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失之偏颇后,首次提出了“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的概念,无疑是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吕俊教授在对西方已有几种翻译研究范式进行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尝试重新建构翻译本体论的知识体系,等等。

第三、西方译论术语在中国的适用度亦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政治、国情之下产生的西方术语,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纵然西方译论的贡献对中国译学发展举足轻重,但万不可推行不加分辨的“拿来主义”。另外,西方术语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及其困境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作者简介:朱灵慧,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09062)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韩子满:《排斥、误读与改造——论当前西方译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41页。